

目 录

王友发烈士生前事迹

——1983年7月12日来信……………黄火青（1）

邓平同志墓志……………张爱萍（3）

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周 济（4）

迴山乡革命委员会……………田兴咏（12）

关于遵义大捷及其它

——访张爱萍同志……………于双军（14）

老战士话遵义

——陆定一同志重访遵义记实……………言 直（19）

既是战斗队 又是工作队

回顾十六军兼遵义军分区这段历程……………陈云开（22）

追剿三匪首记实……………路永和（33）

杨德煊只身闯敌营

——陈家骥加强营起义记实……………晋润昌（45）

急风暴雨十二年

忆保卫历史名城迎接遵义解放的斗争……………潘名挥（49）

赵乃康和郑莫黎……………张志乡（60）

黄齐生在遵义老三中……………侯厚文（77）

用心血写生活的人

——追忆青年作家傅泽·····	傅 森 (80)
开设太平洋药房的谌明道·····	龙修成 谌世昌 (87)
鲁屏周杀梅治逸始末·····	市志办供稿 (93)
记遵义萍舸书画社·····	刘庚扬 (108)
回忆湘川诗社·····	申维翰 (112)
我所了解的遵义电影放映史·····	白永福 (118)
遵义通草堆画·····	左 靖 (123)
遵义电业概况·····	喻蓬森 (129)
遵义运盐业销盐业变迁概况·····	周惠儒 杨 云 (136)
遵义名优白酒志·····	原 毅 (142)
董酒商标的变迁·····	刘平忠 (185)

王友发烈士生前事迹

黄火青同志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二日来信

编者按：现将《遵义地区党史资料》第二期黄火青同志《王友发烈士生前事迹》一文在本辑转载，作为第一辑谢树中同志《记遵湄綏游击队的斗争》一文的一个补充。谢文谈到王友发烈士在游击队的事迹，但未介绍烈士的生平。通过黄火青同志的文章，这个缺陷就弥补了。

王友发烈士生前事迹

——黄火青同志1983年7月12日来信

贵州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关于王友发同志的情况，据我记忆：王友发同志江西泰和人，贫农。何时参加革命，何时入党，记不起了。他1933年从红军大学调到工农红军第三师七团任营教导员、团总支部书记。第三师扩编成立红军第九军团时，王友发同志调到军团政治部任地方工作部长。在长征中，红九军团奉命占领贵州所属湄潭、绥阳二县，警戒四川之敌，保卫遵义会议

• 1 •

顺利召开。

当时贵州人民在军阀王家烈长期残酷压迫统治下，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把共产党红军视为救星，群众的革命斗争热情，象潮水般的涌来。我军地方工作任务，是充分发动群众，主要打击恶霸地主，成立农民革命委员会和自卫武装，将没收来的财粮，分配给农民；对富农、小地主，基本是中立政策。在城市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只对政治有严重劣迹的人，才予以制裁。我记得在湄潭城内，只没收过一家商会会长和一名反动省建设厅长的财产。还召开过中小学教员座谈会，宣传党的纲领政策。积极抓紧扩军工作，除各团、营、连自己扩大的以外，军团政治部直接扩大了三百二十名，成立新兵营。该营在泮水、沙土附近老木孔的战斗中，曾起了重大作用，贵州人民真勇敢啊。可惜时间太短（半个月），未取得更大胜利。我军撤离湄潭、绥阳时，为了领导农民斗争，为了准备在贵州扎根（中央当时有此意图），决定将王友发同志留下，担任发动群众游击战争，他本人也很有信心的接受这个任务。

红九军团成立以来，我和王友发同志一起共事，在工作中，我认为王友发同志始终保持着革命旺盛的精神，什么困难也压不倒革命的乐观主义，能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和群众打成一片，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质，从不计较地位和待遇，这是大家公认的。他牺牲了，很可惜，是我党我军的一个损失。很值得怀念和我们学习的。

黄火青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二日

邓平同志墓志

张爱萍

编者按：邓平同志墓志铭，是张爱萍同志1982年1月为红军烈士陵园“邓平同志之墓”题写的，原件存遵义会议纪念馆。这里刊载的，是根据原件抄写的。原件无题，标题是编者所加。

邓平同志，四川富顺人。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官学校毕业生。一九二七年，同黄公略同志一起，由党派到国民党第三十五军第一师第一团作兵运工作。该军第一团于一九二八年平江起义，改编为工农红军。邓平同志历任红五军参谋长、红三军团随营学校校长、红五军军长，红三军团参谋长等职，于一九三五年二月，红军第二次攻占遵义城战斗中，光荣牺牲。

邓平同志对革命事业，艰苦奋斗，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平易近人，英勇善战，为党献身。

邓平同志永垂不朽

张爱萍 敬书

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及其他

周 济

编者按：周济同志，遵义人，是遵义参加革命较早的老同志，已经年逾八十。今年七月回乡探亲，趁此机会，政协邀请他与遵义市党政领导举行了座谈。参加这次座谈的有市委副书记张世德、刘进学，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志经，副书记、市政协主席段青海，副市长胡炜以及周济同志的长子周世禄等。本文就是根据周济同志在会上发言的录音整理的。

回到故乡遵义，心情格外激动。现就自己的回忆，和同志们谈一谈当年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情况，也随便摆谈一些其他问题。

1935年元月初的一个晚间，黔军师长侯汉佑的部队撤离，第二天早晨红军进驻了遵义城。我先在东门口看到一张红军布告，接着又看见城里大街小巷都贴有这种写有“代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的布告，内容是有关红军进城的纪律。我碰上正在周鹤鹿堂为红军筹款的何恩余、任传习、何有邻、孙玺常等进步学生，就和他们一起打土豪、分浮财，为红军集资筹款。我们一起去到老城紫荆花树徐家和南门关杨家打

土豪。那时只听说打土豪有个打字，但不知道怎样打法，我们抬起凳子就朝杨家的花窗打，有个红军对我们说：“东西不等于是土豪”。现在想起来，真是好笑。红军在遵义收集了很多军队需要的东西，还雕刻了许多图章。那时福音堂驻的是红军山西政治部，我在这里碰见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潘汉年，他是随红军先头部队进城的，同他接上了头，感到很高兴。我过去在成都长江书店从事革命活动时就知道他，还读过他编写的《社会形式发展史》等书籍，心里对他早就很敬慕。我和他摆谈了很多情况。当我问到洪湖赤卫队失败后，西南大学的杨邨人写了那篇《几天来匪区里的生活》的事，潘汉年说，这也不能完全怪他，没有把他安置好。潘汉年还问过杨白龙的情况，我知他是从上海到成都去的，当了成都西南大学的教授，后来被国民党枪毙了。在我们摆谈时，邓发同志也在一边与何恩余、任传习谈话，讯问了由川东游击队回遵，组织《红军之友协会》的周诗和的情况，他建议把协会改名为《红军之友社》。随后，邓发和潘汉年两同志告诉我们，毛主席、朱总司令明天要来遵义，要我们发动群众去迎接。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高兴。当晚，我与周诗和、何恩余、任传习等人，在南门关并老三中学生陈庆锡家开了会，连夜写好欢迎标语，制作好彩旗，记得标语用的是《红军之友社》的落款。第二天，我们联系了女中李小侠等，并组织了县学对门那个半工半读贫民学校的学生，部分住在老三中、女中的学生，中午赶到丰乐桥，准备迎接毛主席。遵义有名的人士刘伯庄，张肇奎的叔父等也赶到丰乐桥头接官厅摆开香案迎接红军。那阵国民党造谣说共产党“共产公妻”“杀人放火”，他们还去迎接，说明遵义绅士还好，

对国民党不满。当时我们这批青年学生还与这些有钱的士绅格格不入，不愿和他们站在一起，潘汉年同志便将我们带到桥上去等待。欢迎队伍是以贫民学校学生为主，他们的队伍站得很整齐。

下午，当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等红军首长骑马来到，顿时，丰乐桥上欢声雷动，锣鼓、鞭炮声轰鸣。到了桥头，毛主席他们都下了马。当潘汉年同志将我们向中央领导同志介绍时，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都喜笑颜开，十分亲切地同我们握手。我印象最深的是领导同志中有一个白胡子和一个大胡子。白胡子是林伯渠同志，大胡子是周恩来副主席，当时好多人都把他误认为是法国人。欢迎仪式结束后，红军队伍由欢迎群众拥戴着进了城。潘汉年同志告诉我们，毛主席、朱总司令要讲话，要我们召集群众去听讲。我们一路走一路喊：要听毛主席讲话的就去哟！群众听说毛主席要讲话，都纷纷拥来，人不断在增加，走到了字路口，人多得不得了，把我们挤掉了队，我们只得从大悲阁、中营沟，绕小道跑步到了盘安门才接上。到了府衙门，抬张方桌，让毛主席，朱总司令站在上面讲话。那个地方小，人多，容纳不下，外边墙上都爬满了人。我当时领着大家呼口号，由于心情激动紧张，不知怎样搞的，竟把“中国共产党”错喊成“中国国民党”了，在场的人听了，都为我捏了一把汗，我也抱怨自己，闹出了洋相。哪知毛主席却笑着对我说：不要紧，口号喊错了，重新喊过就是了。于是，我又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朱总司令先向群众讲话，他讲了军事问题，接着是毛主席讲话。毛主席身材高且瘦，满口湖南话，大家不大听得懂，他讲话时还不断打着有力的手势。

他号召工农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革命政权。记得有这样一个笑话，毛主席在讲话中间有“苗子”（苗族）没有？大家听成了“庙子”，都答应：“有”。实际上遵义没有或很少有“苗子”。毛主席讲完了，群众不散不走，他只得告诉大家，还有机会见面讲话，人群才散了。那阵，有些老百姓还不知道什么是“红军”，有个人问过我：姓“红”的来了没有？我才告诉他“红军”不是那个姓“红”的，红军是革命的队伍，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是保护穷人的。

红军在遵义期间，潘汉年同志领导我们建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苏区王明路线失败以后，建立革命根据地就是毛主席的思想。当时，党中央是准备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的。那时，红军总政治部驻在天主堂，潘汉年住在里面一间小屋里。天主堂对面的高等小学驻的是地方工作部，邵式平、胡家宾等同志都住在那里。他们亲自发动群众，组织工农剧社，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找过一些人开过会，参加的人有刘伯庄、刘季庄、开油绸铺的刘芷庄等。成立革命委员会要有工人参加，但当时遵义没有工厂，只有去发动手工业工人。我们一家一家地去找店铺的店员，搞油料的工人，丁字口钟金山家的织布工人，老城一个造土枪的兵工厂工人，我原来在冯兴发绸缎铺当店员，知道有个股东姓田的“德兴仁”家具铺，也发动了这个店铺的工人参加，这样就集中了百把个人在天主堂的教堂里开了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筹备会。有这样一个小插曲：织布老板钟金山也来开会，我告诉了潘汉年，把他“请”出去了。第三国际代表李德给我们的印象很不好，我们在教堂里开会，他过去把圣母象、圣经扔了一地。

还动不动就说什么：“我以第三国际的名义……。”筹备会后，分头进行组织，约定在老三中的大操场召开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因参加大会的人多，站满了操场，后来大家都称这次会为“万人大会”。

开会那天，靠操场南面的墙边，搭了个台子，正中间放了两张大方桌。那时还没有扩大器，有个红军拿了个喇叭筒指挥队伍，维持秩序。开会之前，红军宣传队出动帮助，还赶到街头去唱歌宣传。大会主席团的名单有毛主席、朱总司令、李富春、博古等。何恩余、何有邻、任传习、周诗和、李小侯、王木匠和我都上了台，我担任了司仪。记得是博古主持会议。宣布开会后朱总司令讲了话，他讲了红军是什么性质的军队等。毛主席讲话的标题我记得很清楚：《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李富春同志也讲了话。在会上讲话的还有红军代表，一口遵义腔，后来才知道他姓贺，老城煤市附近的人，是去江西参加红军的。龙井沟的王木匠也上台讲了话。有个材料上写的是“灯笼匠”，我记得是“王木匠”，也许是那时他怕，改成姓王也说不一定。讲完话后，宣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有关情况，还通过红军的无线电，通电全国。

革命委员会主席是红军派来的干部罗梓铭，后来在“平江惨案”中牺牲，副主席是王木匠。下设有武装、肃反、财务、文教、工会、农会、妇女等七个委员会。武装委员会主任委员是何恩余。肃反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周兴（延安时期他是公安队长），现在是云南省省长。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是毛泽民，他是毛主席的弟弟，负责财经、筹款，打土豪分田地分东西。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我担任，我当

时叫周守如)“守口如瓶”的意思。文教委员会的委员有徐老徐特立、成仿吾、杨尚昆同志的爱人李伯钊。还有个台湾籍的蔡乾同志担任秘书。妇女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李小侠。工会、农会记不起负责人的姓名了。革命委员会设在总府坝街的豫章学校，罗梓铭、毛泽民和我们都在那里办公。我们还向群众作过宣传。

徐老很关心革命委员会，经常到我们办公地点来，他教我们组织宣传，书写标语，还启发我们用遵义讲圣谕说善书的形式，在热闹的丁字口搭起台子搞街头宣传，他还教我们把缴获来的敌人的帽子，拆开重新缝制，拿竹篾片作“遮阳”，用红布剪好五角星贴上，改成红军帽子。徐老的身体不好，正在“打摆子”(害疟疾)，他身上揣得有治病的“奎宁”，还揣有一本《宗教哲学社会主义与恩格斯》；看一阵书，又吞两颗药。

那时，中央对统战工作就很重视。在丰乐桥接官厅，士绅们打彩旗，放鞭炮迎接毛主席，当时毛主席没有来得及专门接见他们，但随后徐老特意去看过他们。我不熟悉遵义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赵迺康、朱穆伯等先生，但据说徐老也亲自登门拜访过他们。周兴同志也给我讲过对待军阀家属的政策。

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大家要吃饭，得找个会搞总务的。有个喜爱川剧锣鼓的“玩友”，叫唐登武，遵义城有什么大事、红白喜事，都是由他办，我就请他去搞总务。为补过阴历年，还杀了一条牛给大家吃。

革命委员会审理案件时，镇压过两个人：一个古式巷的姓黄的屠户，他拒绝使用苏维埃钞票，态度顽劣；另一个是老城杨柳街侯汉佑的一个收租管家，他在乡下打死了一个农

民。我们也打过商会会长喻界凡的土豪，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在他家楼上看到很多瓷器，吃饭需要，也弄走了一些。

革命委员会还有外围和基层组织。当时成立的迴山乡革命委员会，就象现在的乡政府一样。那时，邵式平同志曾找过我，要我向他介绍思想进步的农民、工人，准备成立迴山乡革命委员会。我岳母在养鱼池，我就向他介绍了附近熟悉的邱本立、唐荣奇等人，还将北门外新舟坝张继才的一位佃户，鲤鱼田一户姓李的农民介绍给他，邵式平同志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迴山乡革命委员会。邱本立当主席，唐荣奇等是委员。他们也在那一带打土豪。玉皇观隔壁公馆那个周家，是恶霸，农民交不起租子，就吊起来用鞭子打，农民很愤恨，迴山乡革命委员会就惩罚了他。

很多红军同志说，他们从江西出发一直到遵义，没有见过这样好的群众。中央本来要在这个地方建立根据地的，后来情况不允许，才决定撤离的。红军在遵义，人员、物资、财经都得到了补充。不少人参加红军，扩大了红军队伍。红军筹款，一方面向大盐行、大商号、绸缎铺等募捐。还有一个法子就是土豪劣绅可缴款免于处理，即用罚款的方式筹款。

红军撤离遵义时，担任革命委员会主席的罗梓铭要回部队，又到处找不到王木匠，罗梓铭就要我代理他的职务，把革命委员会的这一批人带出去。他要我写一份早年在成都参加革命和入党的情况交给他。有个叫张士明的坚决要求参加红军，和部队一块走，罗梓铭动员他留下。但他非常坚决，说服不了，最后他还是跟红军一起走了。“红军之友社”的女同志由李伯钊带起跟部队走了，这个社的男同志跟着我们一块撤离。我们临走时柏辉章的部队已经打到了红花岗来了，

才出北门，到高桥就听到了敌人的枪声。后来懒板凳（南白镇）的革命委员会的一部分人，也合到我们一起，跟着红军三军团撤离。随后，在行军路上，再用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就不行了，我们被编到地方工作部，扩大红军，搞宣传，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潘汉年同志含冤二十八年，死于湖南，好在现在把他的骨灰送到了八宝山，英灵得以告慰。邵式平同志曾任江西省委负责人，1955年病故。他们为建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立下了不朽的功绩。人民永远怀念他们。

关于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就谈这些。

李永麟整理 周世禄校订

迴山乡革命委员会

田兴咏

原遵义县迴山乡革命委员会是中央红军来到遵义后帮助人民群众建立起来的一个乡级革命政权组织。地址在遵义新城西南面坳上周家院(今遵义万里路迴山乡巷内)。迴山乡包括遵义城南的几条大小街道和邻近的几个乡村。这个地方原名“迴山镇”，因“迴龙山”得名，红军来后改为“迴山乡”。

原遵义县迴山乡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在丰乐桥头的“官厅”举行，推选农民邱本立当主席。委员会内有委员、文书、通信员、炊事员等多人。成立大会刚一结束，农民们、居民们和组织起来的工人游击队员一道，带着第一次翻身作主人的喜悦，满怀激情地拿着旗子，放着火炮，敲锣打鼓地举行了一次一千多人参加的大游行。热闹的队伍经过新老两城，大长了工农的革命志气，大灭了地主、官僚、统治阶级的威风。人民群众一路高呼口号：

打倒大土豪罗徽五
打倒大恶霸周子光
打倒大地主徐人凤、蹇范五！
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

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从新城一直走到老城的琵琶桥红军总司令部（即遵义会议会址）驻地才散去。

迴山乡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打土豪、分田地。决定将打土豪的具体任务交给游击队。分田的办法是种田的人分田土；卖水果的分果树、果园；种菜、卖菜的分菜园。同时组织了几个“插田队”，削制了若干一尺多长、二指来宽的竹片，写上农民的姓氏、名字，准备“插牌分田”。“插田队”在红军带领下，忙碌了三、四天，将城南的蓝家堡、土地坝一带的蕉园、窑坑、小院、龙洞湾、向家塆、水鸭湾、张家湾、上水关、堰塘、土地、攒山等地属于军阀、地主的田土分头插完。迴山乡一片片欢欣，真是“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后来，因为红军执行战略任务，迅速离开遵义转移，迴山乡一带的田土没有分成。

另外，迴山乡革命委员会还作了很多支援红军的工作。比如组织了几百人的运粮队，把离城十多里内的地主、官僚家的谷物运来，加工碾成白米，然后送到城里各个红军部队、游击队驻地，供给他们食用。

关于遵义大捷及其他

——访张爱萍同志

于双军

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遵义大捷，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因而调查研究遵义大捷的始末，一直是我们采访的中心问题之一。前不久，我们在北京访问了原红三军团十一团政治委员张爱萍。

张爱萍同志告诉我们：虽然事隔四十七年，但他对遵义大捷的这段经历，仍保留着深刻的印象。

他一边用铅笔勾划当时的行军草图，一边说：记得我们一渡赤水河后，到达云南扎西地域集结，部队进行整编，取消了师级建制，许多干部下到连队，充实了基层的战斗力。当时我由师政委改任三军团第十一团政委。三军团由原来的三个师缩编成四个团：第十团团长是张宗逊，政委是黄克诚（不久又由杨勇任政委）；第十一团团长是邓国清；第十二团团长是谢嵩，政委是钟赤兵；第十三团团长是彭雪枫，政委是李干辉。经过改编，部队的战斗力加强了，为下一步机动灵活的作战创造了条件。当时敌人又从四面八方围扎西，中央决定在敌包围未形成之前，转头东进，再入贵州，

打敌人的薄弱环节。我们三军团在二郎滩用几只木船搭浮桥渡过赤水河，当时黔敌魏豺狗（魏金镛的绰号）部的两个团已抢先占领河对岸的制高点，我们在背水作战的不利条件下，迅速展开向敌发动猛攻，将其击溃。然后向桐梓疾进。大约在二月下旬，我们的主力部队已集结在桐梓周围，一军团在城北，三军团在城南，当一军团拿下桐梓城后，我们当即向娄山关逼进。这时听到娄山关方向有稀疏的枪声，知道黔敌已控制了娄山关。主攻娄山关的任务由第十三团担任，他们向娄山关疾进的途中，与敌便衣队遭遇，将其打垮，并分路追击。首先夺取了关口左侧的一个制高点，然后向关口冲击。敌人负隅顽抗，搞我们的车轮战，我们刚夺下一个山头，还没站稳，他们又扑过来了，就这样一直拼杀到黄昏，敌人支持不住了，我们夺下娄山关。

为了尽快消灭阻挡之敌，当晚我们改变了部署。前线总指挥彭总命令我这个团配合一军团一团部，绕道几十里经石炭关直插板桥镇断敌退路；命令十团出左翼插到黑神庙，奇袭敌团部；十二团、十三团则在关口一线正面出击。第二天，约是二月二十六日凌晨，敌我双方又开始了激战。我们到了板桥镇，打了敌人的旅指挥部，敌人乱了，垮了，很多都钻山沟跑了。这时我们得到了吴奇伟（国民党中央军）过乌江增援王家烈的情报，因此还未来得及休息，又接到了向遵义急进的命令。于是，我立即带领部队迅速南下。次日拂晓前，我带着前卫连赶到了遵义城北约十里路的一个地方，趁天还未亮，摸到了敌人阵地前面，准备偷袭，但不知谁掉到了沟里，弄出了响声，惊动了敌人，他们集中火力对付我们。当时由于后继部队还没上来，我们的意图暴露了，人又少，